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统计学与应用, 2026, 15(11), 13-2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6.1511240

Hans汉斯

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张文欣，刘志强

北京建筑大学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3日

摘　要

跨境电商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形态，在拓展市场机会、促进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调整对不同家庭产生差异化影响。本文基于2014~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显著提高了家庭未来返贫风险，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发展的风险效应在农业户口、大规模家庭及低人力资本家庭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发展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家庭返贫风险，劳动力市场调整可能成为跨境电商影响家庭返贫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带来的发展机会并非所有家庭均能充分分享，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家庭可能更容易受到其伴随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影响。

关键词

跨境电商发展，返贫风险，贫困脆弱性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Household Poverty-Return Ris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FPS

Wenxin Zhang, Zhiqiang Liu

School of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Received: Octo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3, 2026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digit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ands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文章引用: 张文欣, 刘志强. 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基于 CFPS 的经验证据[J]. 统计学与应用, 2026, 15(11): 13-22. DOI: 10.12677/sa.2026.1511240

promotes economic activity, but it may also exert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different households through labor market adjustment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or 2014~2022, this paper employs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household poverty-return risk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households' future poverty-return risk,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isk eff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households with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rge household size, and low human capital.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affects household poverty-return risk by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suggesting that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may serve as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 through which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luences household poverty-return risk.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cross-border e-commerce are not fully shared by all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s with weaker risk-bearing capacity may b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accompanying labor market adjustments.

Keywords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Poverty-Return Risk,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消除贫困、巩固减贫成果和防范返贫风险，不仅关系到全球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长期以来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重视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到 2020 年底，中国实现了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对全人类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治理就此结束，已有研究发现，部分脱贫家庭虽然已经达到脱贫标准，但其收入基础和风险抵御能力仍较为有限，在经济波动或其他外部冲击下仍可能重新陷入贫困(张鹏等，2022) [1]。因此，随着贫困治理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巩固脱贫成果，如何识别并降低家庭未来的返贫风险，仍是当前贫困治理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逐渐成为国际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形式。在乡村振兴、“互联网+”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背景下，跨境电商依托数字平台降低交易的地域限制，为不同地区和群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并不一定能够被不同群体平等分享。数字技术具有一定的技能偏向性，跨境电商发展伴随的数字化应用和要素集聚可能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使部分发展收益更多集中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和核心区域，并对低技能劳动者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陈东和郭文光，2024) [2]。对于收入基础较为脆弱、风险缓冲能力有限的贫困边缘家庭而言，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的不稳定可能使其更难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增加未来返贫的可能性。因此，跨境电商发展在带来市场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伴随劳动力需求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对家庭返贫风险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有必要从微观家庭层面加以考察。

[1]截至 2020 年底，按照 2300 元/年·人(2010 年价格)的贫困标准，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以全面消除，这标志着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本文基于 2014~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跨境电商发展显著提高了家庭返贫风险，在更换变量、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大规模家庭和低人力资本家庭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是跨境电商影响家庭返贫风险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说明跨境电商发展伴随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可能给部分家庭带来额外的风险压力。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上，本文由静态收入贫困拓展至动态返贫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框架，将跨境电商发展与微观家庭贫困风险相联系，从未来风险而非当期贫困状态出发，拓展了跨境电商与家庭福利研究的分析维度。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将跨境电商发展与家庭返贫风险联系起来，并从最低工资标准这一可检验渠道考察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从劳动力市场调整的角度进一步解释跨境电商发展影响家庭返贫风险的路径。第三，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家庭特征下的影响差异，关注户口性质、家庭规模和人力资本等特征所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比较不同类型家庭在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差异，为理解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非均衡影响提供微观证据。

2. 理论与机制分析

2.1. 跨境电商发展对返贫风险的直接影响

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经济发展在创造新的增长机会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风险，并通过日益复杂的经济联系传导至微观主体(Beck, 1992) [3]。这种风险并不会由不同群体均等承担，风险缓冲能力较弱的群体往往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跨境电商作为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融合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在拓展市场空间、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使部分家庭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跨境交易规模扩大，国际需求变化、价格波动、汇率调整、物流成本以及贸易政策变化等因素可能通过经营和就业渠道传导至家庭，增加其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于贫困边缘家庭而言，由于风险缓冲能力相对有限，外部市场冲击更容易转化为收入和消费波动，并进一步影响其未来的贫困状态。由此来看，跨境电商发展虽然能够创造新的市场和增收机会，但其伴随的风险暴露也可能给部分家庭带来额外压力，尤其是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家庭，风险暴露的增加可能抵消其从跨境电商发展中获得的部分收益，从而提高未来返贫风险。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

H1：跨境电商发展会提高家庭返贫风险。

2.2. 跨境电商发展影响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影响返贫风险

跨境电商发展不仅改变市场交易方式，也推动数字技术向生产经营环节渗透，进而重塑劳动力需求结构。数字技术具有技能偏向性，可能提高企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并压缩低技能、常规岗位的就业空间。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会带动物流、仓储、平台服务等岗位扩张，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从制造业、零售业转向物流和平台就业，但此类岗位往往具有临时性、计件化和非正规化特征，工作稳定性和收入可预期性较低。面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压力与收入保障需求，地方政府可能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来抬升劳动报酬下限。然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在改善部分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促使企业减少低技能岗位、缩短工时、调整用工结构或转向灵活用工，从而转移成本压力(Levin-Waldman, 2000) [4]。对于人力资本和风险缓冲能力有限的贫困边缘家庭而言，就业机会减少、正式合同覆盖下降和劳动收入波动加大，会削弱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并提高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因此，跨境电商发展可能通过改变劳动力需求结构并引发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进而影响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稳

定性和收入波动，最终增加贫困边缘家庭的返贫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

H2：跨境电商发展通过影响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影响家庭返贫风险。

3. 数据与模型建构

3.1. 变量说明

贫困脆弱性(vep)：根据动态贫困理论，家庭的贫困状态会随时间变化(Bane & Ellwood, 1986) [5]。合理预测家庭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风险尤为重要，而贫困脆弱性指标侧重于衡量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因此贫困脆弱性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地，本文将家庭 t 期的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其在 t + 1 期陷入贫困的概率。通过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量化样本期内每一年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另外，消费能更真实地衡量居民所获得的效用和福利，且消费数据调查误差相对较小，因此依据 CFPS 中的家庭消费水平构建消费波动模型计算贫困脆弱性，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估计人均消费方程，得到残差项后继续进行 OLS 估计，方程如下所示。其中，C_i 表示样本家庭的消费水平，X_i 代表与家庭消费相关的系列变量：

$$\ln C_i = \alpha_1 X_i + e_i \tag{1}$$

$$\hat{e}_i^2 = \beta_1 X_i + \varepsilon_i \tag{2}$$

第二步，以第一步为基础构建权重，对消费均值和残差平方再进行加权回归，其中是消费期望的一致估计，是消费方差的一致估计：

$$E\left(\ln\left(C_{i,t+1}\right)\middle|X_{i,t}\right) = X_{i,t}\hat{\alpha}_{\text{FGLS}} \tag{3}$$

$$\text{Var}\left(\ln\left(C_{i,t+1}\right)\middle|X_{i,t}\right) = X_{i,t}\hat{\beta}_{\text{FGLS}} \tag{4}$$

第三步，假定人均消费对数服从正态分布，选择贫困线和脆弱线计算贫困脆弱性：

$$\hat{V}_{i,t} = \text{Prob}\left(\ln\left(C_{i,t+1}\right) \le \ln \text{poor}\right) = \phi\left(\frac{\ln \text{poor} - X_{i,t}\hat{\alpha}_{\text{FGLS}}}{\sqrt{X_{i,t}\hat{\beta}_{\text{FGLS}}}}\right) \tag{5}$$

结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选择日均 3.2 美元作为主要贫困标准来计算贫困脆弱性(Dong et al., 2021) [6]。此外在度量贫困脆弱性时，基于其能够有效反映贫困脆弱性高风险区间、家庭缓冲储备的临界状态以及动态贫困识别中的政策干预标准，因此本文将脆弱线设定为 0.4。

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跨境快递业务收入(亿元)”的自然对数作为地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

中介变量：本文中介变量分别选取最低工资水平，采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对数衡量。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Hamilton et al., 2021；郭露和刘梨进，2023) [7] [8]，综合考虑可能会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后，本文控制了个人控制变量和家庭控制变量。其中，在个人控制变量层面上，本文控制了每个家庭户主的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在家庭控制变量层面上，本文控制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房屋产权情况等。此外，还控制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省份经济发展状况，用人均 GDP 对数衡量。

3.2. 数据来源

本文衡量贫困脆弱性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 2010 年正式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其中每两年进行一次访问，详细记录了样本中家庭成员在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

的数据。根据研究主题，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本文通过“财务回答人”识别户主身份并保留户主年龄在 16 岁以上的家庭，并与户主及家庭特征变量进行匹配。第二，将 2014 至 2022 年成人问卷的基本人口特征和家庭问卷的家庭特征变量等合并为五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第三，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本文共获得了 17,582 个家庭样本。其余数据来自邮政管理局、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官方网站。表 1 给出了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Std	Min	Max
贫困脆弱性	0.04	0.2	0	1
跨境快递业务收入	1.74	1.49	0.08	6.29
户主年龄	51.18	12.86	16	85
户主年龄平方	27.85	13.28	2.56	72.25
户主受教育年限	7.54	4.63	0	22
户主婚姻状况	0.89	0.32	0	1
少儿抚养比	0.07	0.21	0	3
老年抚养比	0.19	0.4	0	3
健康状况	2.83	1.32	0	5
现住房产权	0.87	0.32	0	1
地区人均 GDP 对数	10.82	0.42	10.13	12.15

3.3. 模型构建

为考察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估计。考虑到返贫风险具有前瞻性与不确定性特征，采用贫困脆弱性指标作为返贫风险的操作化测度。因此，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

$$Y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alpha_2 C_{it} + \mu_t + \gamma_p + \varepsilon_{it} \tag{6}$$

其中，为贫困脆弱性，为家庭，为时间，为常数项，为跨境电商发展的系数，为跨境电商发展状况，为控制变量的系数，为控制变量，分别包含个人控制变量与家庭控制变量以及区域控制变量；为时间固定效应，为地区固定效应，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4.1. 基准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通过同时考虑个体和时间维度的数据，能够揭示数据中的动态变化特征。固定效应模型尤其适用于控制个体间不变的异质性，即在不同的家庭、地区或时间点之间存在的相对固定的特征。对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chi2(2) = 299.15, p = 0.000 < 0.01)，结果显著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考察跨境电商发展对返贫风险的影响。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Vep			
	(1)	(2)	(3)	(4)
跨境快递业务收入	0.0207***	0.0362***	0.0325***	0.0343***
	(0.000)	(0.000)	(0.000)	(0.000)
户主年龄		−0.0054***		−0.0051***
		(0.000)		(0.000)
户主年龄平方		0.0095***		0.0093***
		(0.000)		(0.000)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71***		−0.0071***
		(0.000)		(0.000)
户主婚姻状况		−0.0161**		−0.0142**
		(0.023)		(0.045)
少儿抚养比		−0.0252***		−0.0240***
		(0.000)		(0.001)
老年抚养比		0.0127**		0.0130***
		(0.011)		(0.009)
健康状况		0.0033**		0.0033***
		(0.010)		(0.009)
现住房产权		0.0190***		0.0195***
		(0.001)		(0.000)
地区人均 GDP 对数		−0.0674***		0.0340
		(0.002)		(0.286)
Cons	0.0485***	0.8098***	−0.0782	−0.3405
	(0.000)	(0.000)	(0.163)	(0.35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N	17,582	17,582	17,582	17,582
R^2	0.025	0.091	0.033	0.097

注：括号内为 p 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下同。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列(1)~列(4)汇报了跨境快递业务量(对数)所表征的跨境电商发展对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列(3)和列(4)同时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且各列

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跨境快递业务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在相同固定效应设定下，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有所上升，整体保持稳健。这可能与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就业结构调整和收益分化有关：对于风险缓冲能力较弱的家庭，其未必能够充分分享数字贸易扩张带来的发展机会，反而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和收入波动。总体而言，基准回归结果支持假设H1。

4.2. 稳健性检验

4.2.1. 更换被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中，贫困脆弱性采用二元变量进行衡量，但二元指标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的差异。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连续形式的贫困脆弱性概率(Vul)作为被解释变量(Gallardo, 2018) [9]，以检验核心结论是否依赖于贫困脆弱性的具体度量方式。回归结果见表3列(1)。结果显示，以贫困脆弱性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跨境电商发展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后，核心结论未发生改变。

其次，本文更换“脆弱线”以重新识别家庭是否属于贫困脆弱家庭，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地，本文采用0.29的“脆弱线”：若家庭贫困脆弱性数值高于该脆弱线，则将其识别为贫困脆弱家庭，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回归结果见表3列(2)。结果显示，以家庭是否贫困脆弱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跨境电商发展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稳健。

Table 3. Robustness checks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
	(1)	(2)	(3)	(4)
跨境快递业务收入	0.0494***	0.1153***		0.0344***
	(0.000)	(0.000)		(0.000)
跨境快递订单量			0.0063***	
			(0.007)	
Cons	0.042***	0.1468	−0.2487	−0.0161
	(0.008)	(0.805)	(0.513)	(0.1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7,582	17,582	17,582	14,394
R^2	0.375	0.181	0.095	0.103

4.2.2. 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核心解释变量具体衡量方式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跨境快递订单数量替代原有的跨境快递业务量指标，以重新衡量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回归结果见表3列(3)。结果显示，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后，其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2.3. 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

考虑到2020年正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集中暴发时期(袁航，2026)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家庭就业、收入和消费等产生特殊影响。为排除这一特殊时期宏观冲击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2020年样本，并利用其余年份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列(4)。结果显示，在剔除2020年样本后，跨境电商发展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核心结论并非主要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特殊冲击所驱动。

4.3. 异质性检验

家庭内部特征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面临的返贫风险与经济适应能力。本文从家庭成员在户口性质、家庭规模与人力资本这三个角度分析。

户口性质差异：城乡发展差异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尽管近年来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推进，城乡之间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资源获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依据户主户口性质，将样本家庭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组，具体结果见表4列(1)和列(2)。结果显示，跨境电商发展对农业户口家庭返贫风险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户口家庭的就业和收入来源相对有限，在跨境电商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其获取新就业机会和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相对较弱，因而更容易受到收入波动的影响。相比之下，非农业户口家庭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相对多元，风险缓冲能力较强，因此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Variable	*VEP*		*VEP*		*VEP*	
	(1)	(2)	(3)	(4)	(5)	(6)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大家庭	小家庭	高人力资本	低人力资本
户口性质	0.0164**	−0.0020				
	(0.016)	(0.741)				
家庭规模			0.0231**	0.0016		
			(0.017)	(0.223)		
人力资本					0.0054	0.0134**
					(0.174)	(0.0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2657	4085	8396	5998	4643	12,939
R^2	0.1298	0.0762	0.1748	0.0170	0.0294	0.1280

家庭规模差异：家庭规模不同，其收入来源、支出压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家庭成员超过3人的家庭划分为大家庭，将成员不超过3人的家庭划分为小家庭，结果见表4列(3)和列(4)。结果

显示，跨境电商发展对大家庭返贫风险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庭成员较多，日常生活和教育等支出压力相对较大，家庭资源在成员之间的分配压力也更高。当跨境电商发展伴随就业结构调整和收入波动时，大家庭较难通过短期调整支出和劳动力配置来完全消化这一影响，因而更容易面临返贫风险。相比之下，小家庭人口负担相对较轻，收入和支出的调整空间较大，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相对较强。

人力资本差异：户主教育水平是衡量家庭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也会影响家庭获取就业机会和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王汉杰，2024) [11]。本文将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定义为高人力资本家庭，其余家庭定义为低人力资本家庭，结果见表 4 列(5)和列(6)。结果显示，跨境电商发展对低人力资本家庭返贫风险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跨境电商发展伴随数字技术应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职业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低人力资本家庭在信息获取、技能转换和就业调整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当原有就业机会受到影响时，较难及时转向新的就业岗位，因而更容易受到收入波动的影响。相比之下，高人力资本家庭在信息获取和就业调整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强，因此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4.4.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对跨境电商发展通过影响最低工资从而影响返贫风险的机制进行回归。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12]，采用两步法分段检验。设定计量方程(7) (8)

$$\text{Mediator}_{it} = \theta_0 + \theta_1 X_{it} + \theta_2 C_{it} + \varepsilon_{it} \tag{7}$$

$$\text{VEP} = \gamma_0 + \gamma_1 \text{Mediator}_{it} + \gamma_2 C_{it} + \varepsilon_{it} \tag{8}$$

其中 Mediator_{it} 为中介变量，表示最低工资，C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_{it} 为随机误差项，θ_1 表示跨境电商发展对中介变量的影响，θ_2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γ_1 表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γ_2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分段回归结果如下表 5 所示。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表 5.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最低工资标准	*VEP*
	(1)	(2)
跨境快递业务收入	0.0837***	
	(0.000)	
最低工资标准		0.0793***
		(0.000)
Cons	−2.8630***	0.4972**
	(0.000)	(0.0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17,582	17,582
R^2	0.907	0.088

具体来看，列(1)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提高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可能的原因是，跨境电商发展带动仓储、物流、包装、客服等相关环节的用工需求，进而影响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活动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地方政府也可能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动者收入保障。列(2)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家庭贫困脆弱性反而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部分企业可能通过减少低技能岗位、调整用工方式或加快技术替代等方式进行应对，从而影响部分低收入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和收入预期。此外，用工成本的上升也可能通过价格传导增加家庭生活成本，削弱实际购买力和风险缓冲能力，进而提高家庭返贫风险。总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回归结果与 H2 一致。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4~2022 年 CFPS 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跨境电商发展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发展显著提高家庭未来返贫风险，且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发展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家庭返贫风险，劳动力市场调整是重要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该风险效应在农业户口、大规模家庭及低人力资本家庭中更明显。这说明跨境电商虽拓展市场机会，但收益并非均等分享，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家庭更易受劳动力市场调整冲击。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关注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不同家庭面临的就业和收入风险，重点关注农业户口、大规模家庭和低人力资本家庭，及时了解其就业变化和收入波动情况。第二，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充分考虑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就业状况，针对低技能劳动者可能面临的就业压力，加强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岗位衔接，降低劳动力市场调整带来的影响。第三，加大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家庭的就业和技能支持，帮助其提高非农就业能力，拓宽收入来源，同时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障等基本保障，增强家庭应对收入波动的能力。总体而言，在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及家庭风险分化，使数字贸易发展与防范家庭返贫相衔接。

参考文献

[1] 张鹏, 吴明朗, 张翔. 家庭财政转移支付如何有效阻止脱贫家庭重返贫困——基于多维返贫测量视角[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6): 61-76.

[2] 陈东, 郭文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技能溢价——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3): 173-192.

[3]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53-74.

[4] Levin-Waldman, O.M. (2000) The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A Business Respons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4**, 723-730. https://doi.org/10.1080/00213624.2000.11506303

[5] Bane, M.J. and Ellwood, D.T.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 1-23. https://doi.org/10.2307/145955

[6] Dong, Y., Jin, G., Deng, X. and Wu, F. (2021)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nd Its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31**, 130-148.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21-1836-x

[7] Hamilton, R., Bach, M., Heinrich, S.P., Hoffmann, M.B., Odom, J.V., McCulloch, D.L., *et al*. (2020) VEP Estimation of Visual Acuity: A Systematic Review. *Documenta Ophthalmologica*, **142**, 25-74. https://doi.org/10.1007/s10633-020-09770-3

[8] 郭露, 刘梨进.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6): 129-144.

[9] Gallardo, M. (2018) Ide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Critical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2**, 1074-1105. https://doi.org/10.1111/joes.12216

[10] 袁航. 智能制造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6(6): 96-112.

[11] 王汉杰. 数字素养与农户收入: 兼论数字不平等的形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3): 86-106.

[12]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